

● 牛建強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明代人口流动

社会变迁



建强按：本书雏形《明代流民问题的初步研究》于1987年初脱稿，时拟出版，我的业师、著名明清史专家李洵先生欣然为之作序。后遭遇变故，未能如愿。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时日之后，际逢学术、出版昌明，此书始有望付梓。先生闻之，喜悦有加，不嫌繁复，又慨诺为充实本另作一序。不幸，先生于去年突患直肠癌辞世，此事遂成终生遗憾。先生之序本初虽只是就其中部分内容评议，但其价值远逾于此，于中陈述了他对明代社会史的精辟见解，对明代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治明史者弥足珍贵的文献。在该书出版之际，仍将先生之序置诸卷首。

序 言

我们在读明史时都知道，在公元15世纪中叶前后出现过一种全国性的流民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40年代左右还没有消失。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少见，表面上看似是一种带有循环性质的现象，但是历

史上每次出现的流民现象,都有它的具体的社会条件与背景。它总是标志着历史发展中社会的某种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的动荡与危机。

明代的流民现象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晚期,其社会条件与背景已不同于前此中国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流民现象。这一次中国历史上全国性的大规模流民历史运动,其深刻性要超过前代。透过明代中期出现的流民现象来解析这次历史运动的本质,将是深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晚期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线索或基本课题。比如在公元16、17世纪出现在中国某些地区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明代流民运动的联系是什么?15世纪中叶后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以及社会的观念形态的发展、变化与流民运动引起的社会震荡、危机究竟有何关系?如果承认明代流民运动与上述问题有着内在联系,那么这场历史运动的性质应当作何解释?

在本世纪50年代初,当我开始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此我读了两遍明朝《实录》,也读了两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学习中我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社会在15世纪中叶后,是不是同当时西方的一些国家一样发生过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明代流民问题是不是这种过程的表现?

二、根据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全过程来看,中国在16世纪以后,曾在个别地区与个别生产领域发生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又为诸多事实所证明,但是这种萌芽却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而仅止于萌芽状态。这当然和中国当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各种前提未能成熟有关,也和中国封建制度不能实际地瓦解有关。因此如作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和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的明代流民运动,也必然发育得非常不充分。它和中国

封建社会结构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它又怎样阻滞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发展轨迹,与东西方国家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因此它的解体过程与西方国家尤其不同,从其内部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与过程也必然不会相同。从而它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城市自治与市民等级的出现……等都不会一毫不差地重复实现,但是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后者又使前者得以确定。各国各民族的资本主义历史行程中的差异和历史趋向的不同,往往是这些因素发展程度和型态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是根据各自的什么条件而产生的?而这种差异又怎样影响着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向?尽管流民现象在各国历史上都曾多少发生过,有一些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其影响和后果也不尽相同。因而,在明代发生的大规模流民运动,紧接着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有较快发展的时期,两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明代的流民运动并没有给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完全的历史前提或充分的两种转化条件,使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被阻滞,被弱化。但这并不等于说明代的流民运动毫无其时代的意义。

四、明代的流民运动其起因和内涵都是复杂的,由此引起的社会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从惯常生活中被排挤出去,成为社会的游离者,其历史的影响则是巨大的。国家劳役户籍制度部分被破坏,计亩征银的条鞭税法出现,农民的佃仆化,劳动力市场的经常化,常备军的雇佣化,白银的货币化,以至政治上的统治危机与改革运动,频繁的党争……都可能与流民运动的巨大冲击有关。公元15世纪的明代中国社会是动荡的,这种动荡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后晚期,意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度和广

度,尚待深入研究,但其变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明代流民问题将是揭开这些历史奥秘的重要课题。

牛建强同志在我这里学习时,对明代流民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勤奋好学,广泛搜集有关史料,努力探讨有关理论问题。几年来终于写成《明代流民问题的初步研究》一书,其史料搜集分析、理论探讨钻研已经比我过去所作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充实与提高。使我高兴的是这本书得以出版,把这一问题新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就此问题提出批评与指正,我想会对公元15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有所开拓,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提高。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不揣浅陋,把我的关于明代流民问题的一些浅见并诸卷首,聊供读者参考。牛建强同志的研究心得与很好见解仍是本书的重要成果。

李 洵

1988.8.15.

自序

—

12年前,师从著名明清史专家李洵先生研习明清史时,我就已开始了明代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关系课题的研究。在先生的指点下,以探寻规律为主旨,以系统研究为方法,对明代社会进行“肌体”剖析。这一课题则是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而确定的。这也是我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的起点。最初,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以对明代前期、中期的流民问题的探讨为出发点。自15世纪三四十年代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场带有广泛意义的大规模流民运动,它和封建社会前期的流民现象相较,甚至看不出太大的相异之点,但它冲破了明初僵固的基层封建控制体系,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与经济进步发生交叉,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口相对自由地流移,市镇集墟体系迅速滋长,独立的手工业、商

业活动的发展,江南地区农业雇工的出现,先进地区农村经济商业化过程的深化,海外贸易的发达等等。这些颇具活力的社会现象也和流民大批地直接介入不可分割。明中期之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流民的活动方式和内容部分地摆脱了传统流民从土地上流出而复归于土地的简单循环的特征,而包含了某些新时代的含义。明代中后期发生了许多异样的变化,许多学者或依直感、或从理性的高度把它们作为近代社会起点的依据。不管这些变化处于何等的程度,发展到了哪一地步,人们又作何种估计,而明代中后期社会发生剧变的这一事实则是无庸置疑的,而作为人口流动类型之一的流民群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历经三年之功,广泛搜求,细心研讨,1987年初算是拿出了个比较粗糙的东西。及至1989年,我又有幸在李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遂在该课题思考的基础上对明代社会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讨。通过分区域和分层次探讨,形成了关于明代社会研究的社会风尚结构理论、社会风尚区域传递理论、社会风尚区域级差理论和一些具体的结论。再转尔审视这一课题时,便感到有一些地方需待充实、提高。这样,原先前中期的流民问题的研究领域就在广度和深度上向前、后作了伸延,形成了关于明代人口流动三个构成部分的框架。这便是这本小书现在的样子。通过本书由雏形到成形的过程和发展过程与我的博士论文交叉研究、互相启发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互为兄、弟。它们对明代社会相对系统的检讨,表达了目前我对明代社会以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

这篇自序既是这本小书的引子,也是这本小书的归结。明代人口流动构成包含三种类型,即明初政府移民,明代前期、中期的流

民和明代中期、后期的工商人口流动。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和各个历史阶段的主体特征进行观照,这三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大体上体现出了时间序列上的先后。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规律的作用,后两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时间上又交织一起,难分难解。

明初政府移民是朱元璋政权打击豪强富户、培植自耕农队伍、复兴农村经济从而建立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以超凡的气魄,承继历史上的移民传统,绘制了一幅绿叶、黄花、丰实的图案,奠定了中国社会朝着近代方向发展的基础。通过南北地区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人地关系的调整,实现了地区间、阶层间的相对谐调的发展目标,保证了明代农村社会近一个世纪内的稳态发展,为明代前期的社会变动和中后期社会的迅速推进奠定了基础。朱元璋为了实现他的这一抱负,设计了一项重建自然经济社会的系统工程。这项复杂工程的实施措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诸多方面则是一贯的和统一的,具体表现为:政府内地诸种政策的保守性、东南沿海地区政策的闭锁性和对待海外诸番政策的内收性。正是这些措施的一体性和执行过程中的强有力才为朱元璋计划的真正落实提供了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明初的这种基础准备,就不会出现明代中后期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的历史结果。这种推论毫不过分。

明代流民运动自15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后,成为一种全国的而非局部的、长期的而非短暂的社会现象。由于历史环境的阶段变化,流民在不同时期的活动内容和方式随之也在转换,故有明代前期流民和中期流民之分界。明代前期流民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颓废的主要因素外,人口自然增殖和华北区生态环境综合症的恶化都产生了助推作用。明代前期的流民现象在表面上和在某些方面的具体流向上,似乎在重蹈着此前历史上流民的故辙,但

在整个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日趋松弛化的规律的作用下,它却打破了明初严密的基层社会统治体系,创造出了一个新事物能有伸展余地的历史阶段,这则是此前流民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结果。而这一历史结果的产生只有当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至明朝这一阶段时才有可能。明代中期的流民活动环境较之明代前期流民的活动环境已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工商业以独立的形态活动和农业商品化运动的纵深发展,这样作为相对过剩劳动力的流民便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被这些部门消化,和工商业、商品农业结合起来,成为塑造明代中后期历史面貌的重要力量。所以,从流民运动演化的这一层面来看,明代中期以后许多流民具有某种必然性地逐渐转化为工商业者,这又可算作我们探讨的人口流动的第三种类型即工商人口流动的范畴了。

由于明代前期、中期有关人口统计数字的失实和不可靠,从而使我们在流民数量的估计上出现障碍,无能为力。弘治间马文升曾作如下估计,当时流民混作僧道的人数不下 50 万。^① 仅此一途已甚可观,其他去向就更可想见了。无论如何,其流移出土地的人口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明代前期和中期的流民运动时间跨度大,波及范围广,我们不能像洒胡椒面那样匀适地事事搜讨,面面皆到。同时为了较深入地阐释和解决一些问题,只能采取典型研究和政府流民政策被动转化过程探讨穿插结合的方法。这样既可避免因巨细不漏可能导致的篇幅的无限扩大,又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使流民运动作为明代人口流动的类型之一而融入明代人口流动贯通研究的总体系之中。

明代中后期工商人口流动是明代前期流民运动对固有统治体

①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 4,《保治》,马文升:《题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

系的冲击和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里不同程度地进行商业化过程的结果,与明代中期和此后流民向工商业的靠拢和介入也有关系。由于生存环境的相对宽松、市镇集墟松散体系的形成、商品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活跃便获得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而赋役银两化的改革迫使所有的人们和市场网络发生更经常的联系,从而使城乡各类产业的商品化过程更为加强,随而出现了带有某种职业转换性质的深层工商人口流动的现象。商人阶层通过市镇集墟沟通了乡村和城市、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利于南北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使整体经济水平得到提高,为国家市场的形成积累条件。如万历二十年代,河南归德府虞城县“养蚕卖茧之家并不纺织,只是卖茧”,专一从事养蚕卖茧而不自织的营生。河南大部分地区“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①。而同期山西省某些地方的“乡村集店居民,可多城中一倍”,比作为地方政治中心的县治规模还大。^②可见,由于南方进步地区的带动,北方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在向前迈进。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势力还将触角伸向日本和南洋诸国的海外市场,而且还和西方早期殖民者葡萄牙和稍后的荷兰发生了交换关系,从而使16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具有世界性。

明代中后期的工商人口流动除了较为直观的地区之间的空间性流动外,随着市镇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坐贾数量的增长和商品农业的兴盛,其经营内容、方式和目的都超越了传统,具有某种职业转换的色彩(有时可能表现得很不彻底),已经拥有了一定意义上深层人口流动的性质。这也正是工商人口流动向深层发展的具体表现,也是其较传统工商业有所突破的地方。

① 钟化民:《赈豫纪略·救荒图说》。

② 吕坤:《展城或问》。

中国 16 世纪以后这种社会的巨大变动是综合性的。随着经济的变动,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所体现出的世态人情也莫不处于变化之中。这也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这一历史阶段之后,已开始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许多方面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突破和动摇封建社会的本质内容,有时甚至还会被对方所利用。对于这种变迁所导致的中国封建社会“垂暮而不死亡”的结果的成因以及这种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的发展前景如何等等并不是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第四章《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取向变换的总体估计》中已提供了初步答案。

笔者通篇旨在揭示明代社会的变化,同样也是在展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变化,因此将落脚点归到能够反映中国 16 世纪后最乐观的发展趋向即工商人口流动上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明代后期就没有了流民的人口流动形式。在北方、在明代后期的某些阶段,流民规模甚至不亚于明代前期之表现。正像笔者在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可以肯定地说,流民(有时也向工商行业转移)和工商流动人口(比较自觉地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的)是交叉存在的,甚至在明中后期的某些时候和某些地区,前者表现得可能还要强烈一些”。明末李自成农军主体即是流民,但它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当时社会环境对他们的范铸和制约,平买平卖、贾市不扰口号的提出正是变化中的社会之要求在农军身上之反映。故在此特郑重强调,笔者列出工商人口流动一章既非是说明代中后期工商人口流动只是唯一的人口流动方式,也非诱惑读者得出明代中后期已发生了社会性质根本变化的结论,相反却欲阐述:明代中后期社会虽已处于剧烈变化的阶段,但这种变化因那些商品经济迅速扩张的成果被封建社会所利用,因而其实现封建社会结构的彻底性突破仍任重而道远。

三

书中经常提到“明代前期”、“明代中后期”等字眼，在这里若不简作交代，恐读者和通常的一些分期混淆而引起混乱。因此，在《研究》自序的第二部分已经作过的解释在这里还得唠叨一番。

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从各自体系的内在特质出发对同一历史阶段划界，其结果可能是不一致的，但其大体的分期界限应该说是不会大相径庭的。其中可能以政治史的波动最大，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一个政府机构的调整或变动、基层社会诸多方面已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上仍旧滞后等等都会使政治史的进程呈现出波动反复、大起大落的特点。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社会“肌体”，以广大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为中心，那些行使各种政治权力的官僚阶层因其对基层社会经常作用的密切关系也被包括其间，所以这种社会史的分期结果应该是其他一切分期标准的轴心和参照。

明代社会变迁的大量材料显示，从16世纪始，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步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集中表现为：市镇集墟经济的复苏、工商阶层开始以独立形态活动、农业经济商业化过程的推进；生活方式标新立异，审美观念在生活许多方面的渗透；人情为金钱异化，人际关系更多地带上利益的色彩；人的自我价值认识的觉悟，等等。我们若以体现人本精神的以人的生产和生活为中心的“标尺”进行划界的话，正德年间应是一般地区的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界限。当然，正像我在《研究》序中所称，“社会较显著的变化自有它的准备阶段，而积累阶段终结后跨入显变阶段，势不可能在某一年或某几年完成，必要经历一个带有模糊性和过渡性的时域”，因此其界线犹如“粗粗的一根线条”，皆可稍稍前伸或后延一些年代。其明代中期和后期之间的界限更不易确定：自正德时起，经历嘉靖、隆庆

和万历初期的演进之后,社会变化向纵深推进的事实在大量材料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但我们又无法确指它们间的分界,故径连称之为“中后期”了。

《研究》中对江南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5世纪50年代的景泰、天顺年间,江南地区以早于其他一般地区至少五六十年时间先期发生变化;当进入16世纪的正德年间时,其他一般地区的变化还只是刚刚起步,而江南地区则又进入了显著的变化阶段。所以,江南地区在明代社会变化中起步最早,此后总是较其他地区领先一步,因而表现得最为典型,变化程度也最高。若让江南地区屈就于一般地区的标准,也不太合适。从当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各地区社会实际发展程度差异的事实出发,在明代社会史中采用和提倡江南地区和其他一般地区各异的双重分期标准也是客观的要求。在这里将这一想法提出,以供大家讨论。

四

明代人口流动三种类型的历史存在符合一种逻辑指向,即明代社会由于人口的不同调整方式和社会经济的不同参与方式而呈递进之势。而历史又是复杂的,第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是在政府的自觉意识下有计划地进行的,具体发生时间可以确定,而后两种人口流动方式在时间界限上却很难分清。这就给我们在章节的安排上带来了一些困难。

从总体来看,笔者采取了非就事论事的原则,在笔法上运用宽幅式的探讨和描述的方法,把具体的人口流动类型放置于当时既定的环境和变化的环境中去理解,真正使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得到客观的解释和描述。

三种人口流动类型虽然各自相对独立,但在明代社会变迁这

一论证的焦点上则取得了统一。因此,各章节的内容是联贯的和交叉的。如明初对元末流民的抑制从而保证了明初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容,若与明代前期、中期的流民运动的内容同观,可窥见明代社会由稳定到动荡的变化。第三章第一节明代前期东南沿海地区政府的防御政策(该节实为明初沿海卫所体系的布建和明初中日外交关系变化二文合成。本拟单独发表,只采结果以减篇幅,时迫未遑,未能遂愿,读者谅之)和第四章第一节中明初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及工商业活动特点的论述,既可使我们找到明初朱元璋建立坚固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影子,又可使我们获得其自身体系变化的线索和其前后自然比较的结果。第一章第四节的有关内容和第二章第一节中明代政治趋于败坏的内容展现了官僚政治敝败的过程以及对明代社会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虽同以人口流动类型之一的流民作为研讨对象,但由于整个社会场景的变化,其活动的方式、内容颇有差异。考虑到这种不同,又兼及其篇幅,遂将其割为两章。这决非把流民作为重点而作的有意安排。同时又将明代后期之流民活动附于明代中期的流民运动一章之末节,这更进一步表明,笔者非在突出流民,而只是把流民作为明代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来看待。

在各章节的讨论中,极明显的一个特色即是始终给予江南地区以一席之地,除了江南地区社会的典型发展、客观上要求如此的根本原因外,另一方面也与本人新近的研究侧重有关。江南地区最早出现流民,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却逐渐弱化,应该说与当地发达的市镇经济、工商业和商品农业以及其他存在渠道(如沦为僮仆)对相对过剩劳动力的吸纳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社会的深入探讨以及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这是寻求中国封建社会独特发展规律和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诸多变形现象的关键处。愿与诸同仁共勉,以

求得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主旨的明清学独立学科的建立。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六日

河阳子牛建强识于古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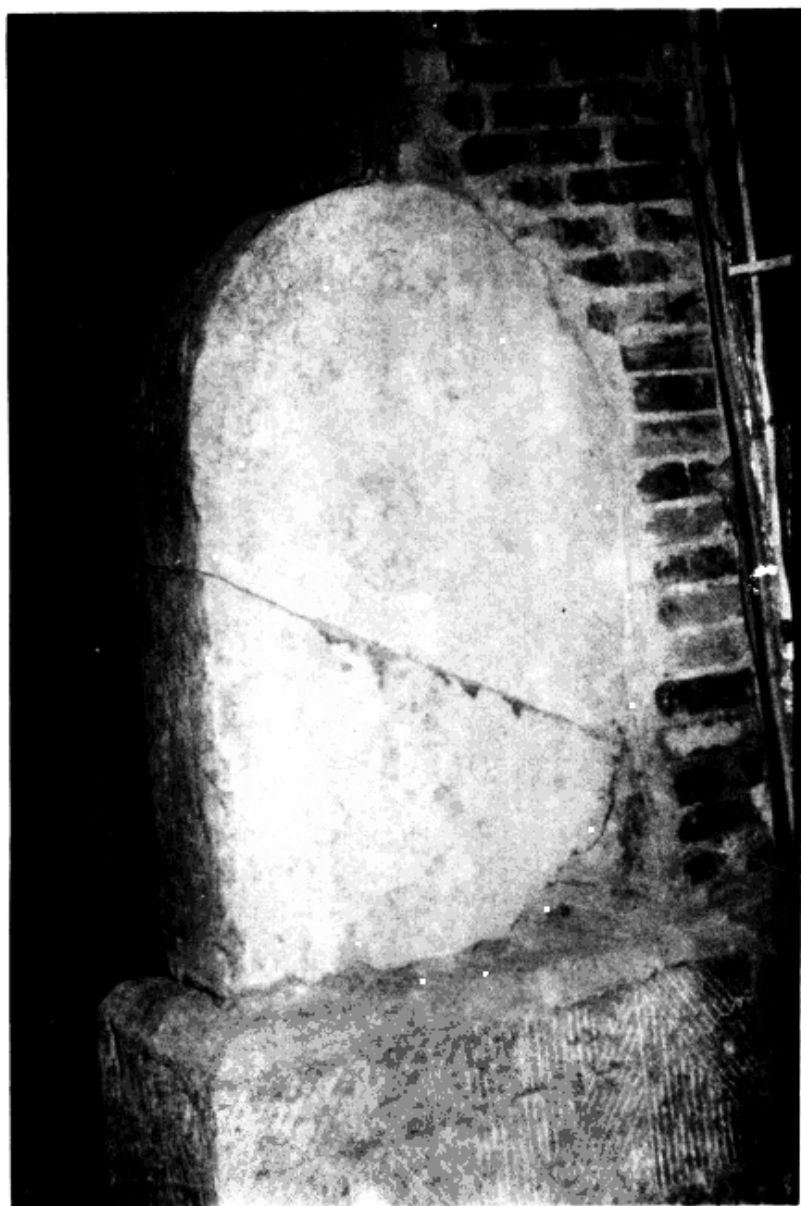


图2 洪武年间山西泽州移民
屯居河南卫辉碑记